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 哲学形态建构的视域转换

冯建华

内容提要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中,本体论视域曾经很长时间作为主导视域,基于这一视域考察可以看到,这一建构进程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到两种实践本体论,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其主导视域是从认识论视域转换到本体论视域,又从本体论视域转换到后本体论视域。第一次转换是为了更加突出实践的作用,提升实践的地位,相应建构了主体性实践本体论、生存论实践本体论两种典型形态。第二次转换正在进行之中,它的目标是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转换的原因一是本体论视域的缺陷已经显现,其从某种脱离现实的终极原则出发来看待现实,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二是后本体论视域具有更加充分的马克思文本依据;三是新时代中国道路实践的现实要求,此为根本原因。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研究范式是出场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 认识论视域 本体论视域 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

冯建华,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221116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创新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共同参照是对传统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反思,其逻辑起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其基本特征是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以实践观为核心的各种理论建构一直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所谓哲学视域就是对各种哲学形态起根本指导作用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它决定了各种哲学形态建构的方向,影响到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也影响到对某一哲学形态核心理论的理解。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过程中,曾经存在着多种主导性研究视域,如认识论视域、本体论视域、理论哲学视域、实践哲学视域等,其中,本体论视域曾经很长时间作为主导视域,深深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哲学形态的建构。立足于这一本体论视域进行考察,呈现各种视域转换的过程及其深层原因,全面认识本体论视域的特点、内涵、意义、内在缺陷以及马克思对待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对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12&ZD108)阶段性成果。

发展方向,建构新时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认识论视域重新回到本体论视域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教科书体系形式,它基本沿袭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模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理论形态,世界统一于物质是其第一原理,本体论视域是其中心视域。这一物质本体论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痕迹,其背后的现实基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虽然在建国初期一度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后来它逐渐陷入僵化,已经基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随着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标准原则的确立,认识论成为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视域,实践唯物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理论形态,在这一形态建构中,物质本体论大为弱化,地位下降。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了进一步突出实践的中心地位,学界提出应将实践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本体论视域逐渐取代认识论视域,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中心视域,在其统摄之下,学界先后建构了主体性实践本体论、生存论实践本体论两种典型形态。

1. 认识论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实践唯物主义形态 1978年,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它破除了“两个凡是”教条的束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它开启了对传统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反思,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道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是,在当时的讨论中,实践观建构仅仅在认识论视域里进行,并没有把实践的作用贯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领域,更没有动摇物质本体论这一理论前提。随着理论反思的深入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仅仅在认识论领域建构实践观已经不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新需要,马哲理论界开始了实践观的新建构。

这一建构的基本思路是进一步提升实践的地位,扩大实践的理论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建构立足于三大基础:一是直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二是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重新寻找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三是立足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实践。从表层上看,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建构直接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理论形态,而我们过去一直对其持批判态度),但在本质上,这一理论形态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植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新实践、奔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趋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更深入的解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活动主体服从于外在自然力、人群共同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物质本体论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形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要求独立性主体人格,这样才能具备明确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契约意识,发挥出理性精神,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有效建立起理性的市场秩序。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弘扬主体性原则,反对依附性人格,反对非理性的个人崇拜,凸显理性精神,积极推动主体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型,因而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必然取代传统物质本体论的理论形态。在文本依据方面,这一理解开始重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等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实践思想,以此作为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本质的根基,弱化了基于恩格斯、列宁文本的阐释路线(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文本依据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中,实践的内涵没有变化,认识论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中心也没有变化,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发生改变,它不再仅仅是沟通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作用扩展到历史观、辩证法、自然观,实践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出发点和解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2. 本体论视域的新建构:主体性实践本体论形态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虽然突出了主体性原则,

但是由于认识论视域依然是其中心,其依然强调物质本体论、物质第一性的前提,所以并没有根本动摇旧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基础,实践的主体性地位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性、统一性、本源性,仍然受到限制。很多学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强调和提升实践观的理论地位,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根本的出发点和解释原则,同时还是一种本体论,把它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由此,20世纪80年代末建构实践本体论的任务(由于实践被理解为主体性实践,主体性原则是其核心,故笔者称之为“主体性实践本体论”)被正式提出,本体论视域逐渐成为此后20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主导视域,影响到以后其他形态的实践本体论,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则成为从认识论视域向本体论视域转换的一个过渡形态。实践本体论与传统的物质本体论虽然都属于本体论视域,但是二者又根本不同,因为物质本体论的实践不具有本体论地位,只是物质本体论在认识论领域中的体现,其作用只能局限于认识论。实践观理解转换到本体论视域,动摇了物质本体论前提,实践直接具有本体论意义,它首先是人的本体性存在方式,然后才是认识论中检验真理性的标准,并且包含着自然观和历史观。实践的现实指向则是市场经济中人的主体性实践存在,实践地位空前提高,而物质范畴或者只是与其并列的本体论范畴,或者不具有本体论意义。这一本体论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新形态,它自觉充当启蒙先锋,批判了传统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前现代性质,彰显了现代性的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带来巨大成就,国力增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过度强调主体性导致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加剧;激烈的市场竞争、片面理解主体性使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隔膜,出现道德滑坡、社会风气恶化、普遍的意义迷茫等危机。这一本体论也存在诸多理论缺陷: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片面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它对本体论进行了泛化理解,认为存在物质和实践双重本体,抛弃了本体论作为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统一性的原本含义,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本体论,在理论逻辑上不彻底、难以成立;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论,通过建构具有终极作用的实践观来完成更加严密、系统的知识体系,忽视人的生命意义,以“知识主体性”压制人的“价值主体性”。以上种种困境导致主体性实践本体论衰落。

3. 实践本体论的新形态:生存论实践本体论 主体性实践本体论衰落和退场后,为了解决它存在的诸多弊端,生存论实践本体论取代之而出场,这一新的本体论建构具有诸多理论和现实基础。如前所述,其现实基础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其理论基础则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思和建设性批评,其直接理论形态则借鉴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视野,典型代表是“以海解马”思潮的出现,如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是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追求”^[1]。其实践观建构的特点是:反对将实践作为知识论哲学的终极存在者,而是将其理解为生存论的终极生命意义,实践的含义是立足于本真的生命意义基础上的在世存在活动,这一活动不再是认识的源泉,更不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而是一种人与世界不分的境界,具有终极意义,它只能作为可能性而存在,通过非理性的领会和筹划才能呈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终极可能性的实践境界、终极意义;这一实践观所包含的辩证结构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与统一,而是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的矛盾,即一方面领悟着本真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沉沦于世,遮蔽和遗忘终极意义,使自己 and 事物都变成现成存在者,处于对立、冲突之中;在真理观上,真理不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的符合一致,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去弊”“无弊”,即人的本真意义的呈现、澄

[1]王庆丰:《存在的澄明与人类的解放——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明。建立在这一实践观基础上的实践生存论本体论则要求自身达于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世界,它反对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知识论路向,反对将马克思哲学限制在传统的理性本体论、认识论、主客二分思维方式、逻辑范畴的表达方式之中。它抛弃了传统教科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内容,对辩证法、历史观进行了意义论、价值论重写,其批判的现实对象是当下社会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物化的存在者和沉沦、异化的存在方式。

生存论实践本体论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面貌,根本改变其基本精神、基本论证方式、理论结构、理论结论、话语方式。它由存在者转向存在,由“是什么的存在”转向“如何存在”,由关于实践的知识转向实践怎样存在,由建构以实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转向追求实践蕴涵的可能的生命意义、生命境界,由传统理论哲学转向现代实践哲学,打破了原来几大板块不同组合的体系结构。

二、对本体论视域的分析与马克思对待本体论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否属于本体论哲学?究竟是否应该在本体论视域中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建构的前提性问题,直接影响到各种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形态建构的合法性。必须深入追问哲学史的原初语境与历史演变才能澄清本体论视域的基本内涵、特点、类型、优劣,更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从词源学来看,“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汉语翻译,这一名词出现于近代,是17世纪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斯在1613年编辑的《哲学词典》中首先使用的,后来,沃尔夫在其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将其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第一部分,其含义是“论述各种关于‘有’(希腊文ont,对应于英文中的to be或being——引者注)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就是抽象的形而上学”^[1]。虽然本体论这一术语产生于近代,但实际上这一理论产生于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学的总体性质就是本体论形态的哲学,其典型代表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哲学虽然实现了“认识论转向”,但那只是哲学重心的转变,并非本体论哲学形态的消失。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杨学功认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属于传统本体论(“特指哲学史上研究某种超验实体的哲学理论”^[2]),它“准确地传达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旨趣——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3],其特点是“以先验逻辑推演的方法构造出来的范畴体系”^[4]。西方传统本体论受到了海德格尔等的批判。俞宣孟先生基于海德格尔哲学认为,being应译为“是”,其主要的含义是指对“是者”(或存在)何为“是”(或存在)的研究,“所谓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它“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它是纯粹的原理,‘第一哲学’”^[5]。他认为,海德格尔开创了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新的类型,批判了西方哲学执着于“存在者”实体而“遗忘了存在”的传统理性本体论,回归本真的“存在”,立足于“此在”在世生存实践,揭示此在的存在方式,呈现各种存在关系。杨学功则将这一生存论界定为“现代存在论”(“特指现代哲学中注重于研究存在方式或关系状态的哲学理论”^[6])。

1. 对本体论的术语、内涵、特点、类型的界定 笔者同意孙正聿等学者对本体论内涵、特点的总体概括:“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9页。

[2][3][4][6]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第5页,第96页,第101页。

[5]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6页。

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是表征人类自身存在的矛盾性或悖论性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体认作为‘意义同一性’的终极价值”^[1]。笔者赞同杨学功等学者的观点，本体论应该翻译成“存在论”，它“泛指一切有关存在的哲学研究，是这种类型或这一领域哲学的一个总名称，一个属概念”，包括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2]。在术语上，笔者不对本体论、存在论、形而上学进行区分，因为不管是关于终极实体、终极存在者的“传统本体论”，还是关于终极意义、终极存在方式的“现代存在论”，其研究对象都是希腊文的 ont 或英文中的 to be, being。虽然历史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两个术语有区别，本体论只是形而上学的中心和第一部分，但就其实质而言，形而上学“在历史上与‘本体论’同义”，“应当成为存在论的同义语”^[3]。

2. 对本体论视域的基本态度 笔者认为，本体论思维方式、各种本体论哲学形态，在哲学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意义，对于理论科学起到奠基和推动作用，使得自然科学得以在西方产生、发展、繁荣。但是本体论总体视域存在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无论是作为终极存在、终极原因，还是作为终极知识、终极意义，无论是理性推演而得，还是感性领悟而得，无论是对现实的奠基，还是对现实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一种脱离现实的先验预设基础上，虽然它的真实内容总包含一定现实内容，但是其理论基础是一种先验的预设，是非现实的、虚假的，是一种理想状态，无法具体证实。所以它在面对具体现实时，不能真实地研究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结构、问题、缺陷，而是站在现实之外，或者在头脑中构造出超感性的、永恒的、理性逻辑的终极存在者，来论证现实、推演现实，代替对现实的具体研究，或者臆想某种理想的、感性境界的终极意义，以此理想为标准来外在地批判现实，不能真实触及现实缺陷的本质，因而也找不到解决现实矛盾、缺陷的真实途径，最后只能在观念中、在头脑中虚幻地克服这些缺陷，实质上掩盖了现实缺陷，进行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辩护。本体论总体视域所导致的现实结果是：或者变成一种维护丧失合理性现实的神话，成为欺骗性意识形态；或者只是对这一非合理现实进行外在批判，实际回避了现实矛盾；或者变成一种教条主义，假借某种终极存在、终极知识、终极意义将某种真实存在状态教条化、永恒化、普遍化。在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中，传统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受到了实证主义的拒斥、批判而走向解体，现代本体论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批判而走向衰落。虽然也有很多挽救本体论的努力，但是本体论哲学难以恢复过去享有的至上地位。

3. 马克思对本体论的基本立场 笔者认为，在本体论视域内，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直接立场，而是后来学者们根据自己国家时代发展的一定要求而进行的建构。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只是在早期不成熟阶段中使用并肯定本体论术语（直接使用的情况也很少），如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站在黑格尔理念论、自我意识本体论立场上，提到“当我们思考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4]，并批判神灵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立场上，肯定过“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5]。但是当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哲学革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之后，再也没有肯定过本体论及其表现，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将自己的哲学称作“新唯物主义”，这一新唯物主义内涵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继续称之为唯一的“历史科学”（自然界、自然史包含在历史科学之中，只能从历史中理解自然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践、“人们的存在”“现实生活过程”、历史存在，它构成了“人

[1]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3]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类历史发展”“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笔者基本赞成俞吾金、王金福等先生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它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而是包括物质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1]。当然,笔者不赞成其中的物质本体论部分,而赞成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的同名词。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2]。在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存在”绝不是脱离具体实践的终极存在、终极知识、终极意义,而是历史性实践和现实生活,共产主义只是作为现实历史运动的结果,而非预设出来的、作为终极存在的逻辑起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是从“哲学基地”、终极哲学原则出发去看待现实生活的思辨哲学、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这正是一切本体论哲学形态的基本做法);其基本原则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的形成”,“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它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4],其基本特征是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历史观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唯一的“历史科学”中所说的“人类史”,即通常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它一方面是作为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是研究特定民族、特定阶段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它不会将已形成的唯物史观内容僵化为不变的教条,而是以此为方法论去具体研究和分析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现实情况,指导其形成具体的发展道路,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出场形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并不是停留于说明整个历史的一般运动规律,而是具体研究他所在的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规律,呈现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出场形态——资本逻辑批判的出场形态。各种本体论形态则是从一般的、绝对原则出发,推出特定时代、民族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对此一直坚决批判,晚年马克思还着重批判了体现本体论视域的“历史哲学”,并把《资本论》阐发的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规律看作是仅限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如果“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

三、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从本体论视域走向后本体论视域

基于对本体论视域的一般含义、特点、类型、缺陷的深入分析,基于马克思对待本体论真实立场的反思,结合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本性,可以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视域的一般缺陷和生存论实践本体论形态的特殊缺陷及其衰落原因。基于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现实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主导视域必然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本体论视域转向后本体论视域,并且以出场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建构。

1. 生存论实践本体论的缺陷与其退场 实践生存论本体论作为一种现代本体论,虽然克服了传统实体性理性本体论的一些弊端,对于矫正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意义丧失、人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带有本体论的内在缺陷:它对现代性的缺陷、对中国市场经济初期问题批判的基础和前提是非现实的、虚幻的,是一种主观构想出来的先验可能性,这种可能

[1]王金福:《“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规定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2]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性存在于个体领悟之中,是面向未来终极意义的理想,这种终极理想难以成为现实。就其实质来说,生存论实践本体论是将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化,其对应的现实基础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应该跳过现代性发展道路。笔者认为,盲目照搬后现代主义哲学、后工业社会发展道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对于中国来说,后工业社会还不是一个真切的现实,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其基本性质仍然是现代性,而非对现代性的完全超越,对现代性不合理方面的批判必须回到对合理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生存论实践本体论过度夸大了市场经济、资本带来的问题与弊端,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取得的现实成就,也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因而这一本体论在21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衰落而退场。

2.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视域的第二次转换 生存论实践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建构的最后一个形态,笔者认为,随着它的衰落和退场,实践本体论也将会衰落和退场。实践本体论的两种形态分别属于传统的实体性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它们不仅自身有缺陷,而且也暴露出整个本体论视域的总体缺陷:从一般的绝对原则出发,推出特定时代、民族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内容和要求,但是这一反映是间接的,其直接的逻辑起点、解释原则依赖于本体论前提——脱离现实内容的终极存在、终极理想,这本质上是超历史的、非具体的抽象哲学原则,而具体的历史内容是第二位的,是由这些永恒原则推论出来的,必须服从于非历史的本体论基础,因而带有理想主义、教条主义的色彩,这必然会陷入某种理论和现实困境,不可能真正、全面表现出历史性、具体性、时代性的本质内容,而不可能真正立足于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不可能真正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因此,一般本体论视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中也将衰落和退场。

21世纪开始不久,学界明确提出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任务和目标,而这一建构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一形态又在怎样的哲学视域中进行?在近十年中,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其中,过去生存论实践本体论的一些代表也提出“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1],这次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建构不同于传统物质本体论统摄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同于认识论为中心视域的实践唯物主义,更不同于本体论视域中的实践本体论。因为第一次视域转换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文本依据,但更多是基于学者们的建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诠释,没有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也没有真正找到只属于中国的、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发展道路。因此,当下的建构将会在理论上更加自觉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凸显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精神,并且致力于寻求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出场形态,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走出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哲学建构,这是马克思哲学当代理解的理论与历史的起点。”^[2]笔者认为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进行第二次视域转换,即从本体论视域转换为后本体论视域。

3. 第二次视域转换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实现从本体论视域向后本体论视域转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本体论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暴露出其视域缺陷;另一方面是这一转换的马克思文本依据更强,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更能体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要求。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则是基于当下中国发展现实的时代要求。21世纪初,中国开始深入总结反思以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再简单照搬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后现代发展模式,而是强调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民族性、历史阶段性,探索和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初步形成“北京共识”,明确区别

[1] 邹诗鹏:《何以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北京〕《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 仰海峰:《走出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当代理解的理论起点》,〔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

于代表西方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沿着这一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图景真实呈现。因此,聚焦当代“中国道路”、面向“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价值”,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并为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引领,就成为一个历史任务和时代要求。由于本体论视域的现实基础是苏联一般发展道路(传统的物质本体论)或西方一般发展道路(两种实践本体论),而非真正的中国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必然走出本体论视域,回归以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为理论品格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只是在与他国道路的差别中显示出来”,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研究它的历史、独特性和当代处境。……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独特的中国社会作出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研究和阐述”^[1]。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建构视域一定是后本体论视域。

4. 中国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研究范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直接指导理论,笔者认为,这一思想理论属于实践理性层面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形态。目前,西方经典现代性发展道路有一套成熟的解释框架、话语系统,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还没形成一套完整、成熟、被世界普遍接受的解释框架、话语形式、学术理论体系,因而,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实践理性成果相适应,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理性的任务就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在这一建构中,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主要作为一般方法论起指导作用,开拓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新实践则决定了其具体出场形态。笔者认为,建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主要研究范式是出场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研究范式“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重新选择出场路径与方式,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在场形态”^[2],它总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依赖关系,表明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新实践才是最根本的时代现实和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场语境。由于这一现实语境不再盲从西方国家一般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因而也就必然要求摆脱作为其理论表征的本体论视域,深入揭示这一出场语境如何决定不同的出场路径、如何造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形态——后本体论视域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形态。新时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性质为新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改造的现代性,构成新现代性”^[3]。它既不同于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以现代性为基础,在批判片面现代性弊端、吸收后工业社会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以信息化引领和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辩证法:既不能理想性地拒斥资本,应该承认资本仍然在新时代发挥积极作用,合理地利用资本;又不能崇拜资本,任其消极因素泛滥,应该理性地坚持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限制资本、驾驭资本。建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要强调中国道路的民族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不仅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内容,而且建构这一理论的民族话语形式,使之成为讲中国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能够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以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中国道路的目标、理论、纲领、举措和策略,在此基础上,将会促进形成一套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解释体系。

[责任编辑:洪 峰]

[1]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2]任平:《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3]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